

西方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与态势

谢立中

摘 要 西方社会学发展迄今已有 150 余年的历史,恰当理解这 150 余年的历史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粗略地划分成三个大的发展阶段,这三大发展阶段上的演化逻辑及各阶段之间的传承流变都具有内在联系。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分化(分歧、分裂)与整合(统合、综合)两种态势交互更替的演变模式。

关键词 西方社会学 发展 过程 态势

作者简介 1957 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若从孔德 1839 年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正式提出“社会学”这一名称算起,迄今已有了 150 余年的历史。如何来把握西方社会学这 150 余年的发展历程?如何来理解它的各个发展阶段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西方社会学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无论对于西方社会学史的整理工作,还是对于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纵览国内的西方社会学史著作,对这些问题大都未有清楚明白的交代。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的探索。

一

西方社会学迄今为止的发展历程可以粗略地分成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

在西方社会学发展的诸阶段中,第一个阶段相对来说显得较为漫长。从 19 世纪 30~40 年代孔德倡议建立社会学算起,到 20 世纪 30~40 年代各种风格的社会学原初模式纷纷亮相、登台出齐,前后约经历了 100 年左右的时间。在这 100 年左右的时间

里,西方社会学界先后产生了一批奠基性的人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观察社会、分析社会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来构思社会学这门关于社会的“科学”的具体样式,从而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产生和形成各自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孔德是正式倡导建立社会学,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第一人。他在其著名代表作《实证哲学教程》的后三卷尤其是第四卷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这种主张。孔德所理解的“科学”,是当时那种以实证方法为特征的自然科学,其基本精神是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和研究结果的可证实性或重复性,具体方法包括观察、实验、比较等。

孔德关于建立实证社会学的主张在英国学者斯宾塞那里得到了响应和进一步的改进。斯宾塞在其社会学主要著作之一《社会学原理》一书中,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进化的思想出发,对社会的结构和社会的变迁过程作了比孔德更为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从而使孔德关于建立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的主张变得更具可行性、更具诱惑力。实际上,斯宾塞在其著作中提出的许多概念如结构、功能、分化、进化等迄今仍是宏观社会学中普遍使用的分析工具。

孔德倡议建立社会学的初衷,是要建立起一门

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关于社会的实证的经验科学。然而无论是孔德还是斯宾塞,都只是热衷于把自然科学原理、方法推广于社会领域,并且其论证和说明都过于粗略。在实际构建社会学体系的过程中,他们都是先构思一种适用于一切领域的一般原理或“第一原理”,然后再从这种一般原理或“第一原理”中演绎出一套社会学原理。这种方法,与其说是像实证的自然科学,不如说是更像思辨的哲学。这是孔德与斯宾塞著作中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只有到了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又译涂尔干)那里才得到了克服。

1895年,迪尔凯姆发表了后来在西方社会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重要著作《社会学研究方法》。在这部书中,迪尔凯姆首次从社会现象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出发,来对实证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进行系统地论述。他明确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与纯粹个体现象不同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准则是要将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解释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就是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迪尔凯姆据此批评孔德和斯宾塞,认为他们都没有真正意识到社会现象的客观特性,没有真正地掌握研究社会的科学方法。在该书中,迪尔凯姆还对观察、分析、解释、检验社会现象的方法进行了具体的考察,确立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社会学实证研究方法,从而为社会学奠定了一个在实证主义者看来真正可靠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使社会学真正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科学学科。迪尔凯姆由此被公认为是西方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孔德关于建立一门有关社会的实证科学的理想一直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所追求的目标,而迪尔凯姆在社会学研究方法方面所作的论述则一直被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尊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准则。但是,即使是在社会学的形成时期,由孔德、斯宾塞和迪尔凯姆所确立的这套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取向也遭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一派挑战来自于诠释社会学。

与实证社会学相反,诠释社会学根本否认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完全一致的假说,而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自然过程的主体是无意识的物质,社会过程的主体则是有意意识的个人,而个人的行动是带有意义的。社会学家要了解社会现象,就必

须去了解这些现象得以构成的个人行动,而要了解个人行动,就必须去了解这些行动所含的主观意义。而这靠自然科学的那种实证研究方法是可能实现的,它必须用一套与之不同的新的研究方法即诠释学的方法才有可能达到。早期的诠释社会学家们并不反对建立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的主张,但他们反对对科学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反对把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主张社会学是一门与自然科学不同的人文学科。

韦伯是诠释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认为社会现实从根本上说是由人们和他们有意义的社会行动构成的,社会学的对象不是脱离个人行动的抽象的社会结构等,而是人本身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对于社会行动,只能用诠释学中“投入理解”的方法去把握,而不能用自然科学的那种只从外部去观察和分析对象的方法来加以考察。与迪尔凯姆相对应,韦伯对诠释社会学的具体方法进行了系统、细致的考察,提出了一套对诠释社会学来说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观点与方法,从而使诠释社会学成为一种不同于实证社会学的切实可行的新选择。

作为诠释社会学的创始人,韦伯对诠释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的论述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他提出了社会行动的性质取决于行动者赋予其上的主观意义,却没有说明行动者是如何赋予其行动以意义的;他认为对行动的主观意义只能用“理解”的方法来把握,但对于理解自我与理解他人的区别以及我们能否理解他人,我们怎样才能更有效地理解他人等问题却几乎只字未提等等。这些问题后来被另一位赞同诠释社会学立场的德国学者舒茨所发现并加以探讨,其成果体现在舒茨的《社会世界的现象学》这部名作当中。舒茨也就此成为诠释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批判理论是本世纪初形成的第三种社会学取向。它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为基础,通过克服、抛弃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成份而形成起来的一种激进的社会理论思潮。批判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强调社会理论的批判性质,强调理论和理论家在改造、变革现实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反对那种旨在维护、修补现存社会结构的单纯解释性的“科学”研究。早期的某些批判理论家如霍克海默甚至把传统的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科学都归之为“传统理论”,将其与“批判理论”相对立,肯定后者而否定前

者。在方法论上,早期批判理论家既反对实证主义的那一套方法,也批评李凯尔特、韦伯等人主张的那一套诠释学的方法,认为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对立和差别,但它们都是把社会现象当作孤立的事实来加以考察和分析。批判理论家们主张以辩证的“总体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社会现实,即将社会现象置于社会的与历史的总体过程当中,从它们在社会与历史的总体过程当中所具有的地位与作用来确定它们的性质、意义,来考察它们的产生、变化和发展。批判理论由此成为社会学理论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取向。批判理论的奠基人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其思想先驱则是卢卡奇等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提出了许多后来被批判理论家奉为主臬的理论与方法观点,如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套社会历史理论,历史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阶级意识在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辩证的总体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基本方法等等。《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因此而成为理解批判理论的必读书之一。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一书,则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批判理论”一词,而且还从社会作用、理论目的、思维主体、研究方法、逻辑结构等方面详细阐述了“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区别,确立了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从而成为批判理论的奠基性作品之一。与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相辉映,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一书,则从黑格尔主义、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出发,批判了实证哲学,论述了批判理论的特点,为批判理论的兴起进行了历史的辩护,从而成为批判理论的另一部奠基性文献。这几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批判理论作为社会学中一个独特理论取向得到了确立。

实证主义、诠释学和批判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初步确立和形成的三种基本的社会学取向或构思。除此之外,在社会学发展的第一大阶段上,还出现了一些其它的具有特色的社会学构思。其中著名的有以主张研究“社会交往的纯粹形式”为特色的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和以主张研究“非逻辑行为”为特色的帕景托的社会学。

这一时期的发展成果,既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前进的新起点,又为后来的发展积蓄了丰富的思想源泉。以后的社会学家总是不断地回到这个阶段的大师们那里来寻找思维的灵感。

2. 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本世纪 80 年代的深入发展阶段

西方社会学在第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是十分可观的,然而其多种取向并立的局面却似乎总使人感到美中不足。怎么样来整合各种不同取向的社会学,使之融合成一个更具综合性因而也更具解释力的社会学体系,几十年来一直是许多西方社会学家所追求的目标。事实上,西方社会学发展的第二个大阶段就是以美国社会学家答尔科特·帕森斯在这方面所作的尝试而开始的。

帕森斯认为,诠释社会学和实证社会学这两种传统都对说明人们社会行动的某一方面作出了贡献,但都未能对社会行动的结构作出完整的说明,必须把它们综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合理说明人类行动的一般理论。帕森斯在他早年出版的重要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他的一般行动理论的基本思想,指出目标、环境和规范是“单位行动”的基本要素,行动就是在物理环境和价值规范两方面的制约下,个体为实现一定目的所发生的动作与过程。这显然是对上述两种社会学行动理论的高度综合。

然而随着其理论分析的不断深入,他的观点实际上似乎越来越接近斯宾塞、迪尔凯姆而远离韦伯等人的立场,逐步发展成一个后来被称为“结构功能主义”的宏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一开始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学界取得了近乎霸主的地位,但很快便受到了人们的激烈批评,被认为具有如下主要特征或者缺陷:(1)过于抽象,缺乏经验基础;(2)过于注重社会过程中客观的层面,忽视其主观的层面;(3)注重宏观分析,缺乏微观分析基础;(4)过于强调社会的一致与稳定,忽视强制与冲突;(5)对现实过于乐观,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等等。顾尔德纳的《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一书就是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进行批评的著名作品之一。

以这些批评为基础,一大批反帕森斯主义或非帕森斯主义的理论取向在西方社会学界繁荣兴盛起来。

针对帕森斯理论体系过于抽象、缺乏经验基础这一缺陷,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中层理论”策略以及用以指导经验研究的可操

作的新的功能分析范式,形成了一种被乔·特纳称之为“经验功能主义”的研究取向,在西方社会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社会冲突理论则是明确针对结构功能主义过于强调均衡、稳定、一致而忽视社会中的强制与冲突现象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特征是强调社会结构的强制性、社会过程的冲突性、社会变迁的普遍性。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和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是早期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代表作分别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权力精英》和《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

随着冲突理论的出现,有一些社会学家指出,无论是结构功能主义还是社会冲突理论都是一种片面的理论,提出要对二者进行综合。在这种思想倾向当中,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和伦斯基的《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十分引人注目。

符号互动主义、本土方法论等理论方向的出现则可视是对帕森斯理论过于注重社会客观层面、忽视主观层面这一缺陷的反动。符号互动主义是以库利、托马斯、米德等人的思想为基础而形成起来的,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是其公认的创始人。符号互动主义倾向于从社会唯名论的立场来看社会,主张人们之间的符号沟通过程是社会过程的基础与实质,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都是人们之间符号互动的产物。布鲁默的《符号互动主义:观点与方法》为符号互动主义确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

本土方法论(又译民俗方法学等)是以强调社会生活中的主观层面为特征的另一个社会学流派。与符号互动论不同,本土方法论更多地是以舒茨的现象学的社会学理论为基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美国社会学家H·加芬克尔通常被认为是这一学说的创始人。加芬克尔1967年发表的《本土方法论研究》一书,对这种理论作了初步论述。所谓“本土方法”,指的是社会成员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构造和解释他们的社会世界并对其赋予意义与秩序时所使用的方法及程序。本土方法论与符号互动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在反对功能论、实证论,偏爱社会生活中微观、主观层面的研究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

社会交换理论则是针对帕森斯理论注重宏观分析而缺乏微观理论基础、注重结构而忽视个人的缺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社会交换的思想在古典经济学、早期人类学中就已存在,但它的充分发展则

主要归功于美国现代社会学家霍曼斯和布劳。在《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一书中,霍曼斯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看成是一种计算得失的交换行为,详细地讨论了社会交换过程的基本原理,并以社会交换过程为基础,重新描述和解释了社会群体、权力、地位、社会制度等社会现象,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交换理论体系。

虽然霍曼斯认为交换论既可用于解释微观现象又可用于解释宏观现象,但他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停留在微观层次上,他的这种作法被批评为具有把一切宏观过程归结为微观个人行为的还原论倾向。布劳试图纠正这种倾向,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书中,他对从微观到宏观的不同层次上的社会交换过程,它们不同的特征以及相互关系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且试图说明宏观的、复杂的社会结构与过程是怎样逐步从微观的、简单的人际关系和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出来的,期待以此来填补社会学中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之间的鸿沟。后来,布劳在他的另一本名著《不平等与异质性》中,又提出了一个“宏观结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又回到了帕森斯重视宏观而忽视微观、强调结构而淡化个人的理论立场上去了。

批判理论的流行则与对帕森斯理论保守主义倾向的批评相呼应。与结构功能主义对秩序的关怀形成鲜明对照,批判理论注重于批判现实,寻求人类解放的新道路。一大批批判理论的著作在战后得到了出版和广泛的流传,如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弗洛姆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哈贝马斯的《理论与实践》等等,从而将批判理论推向了它的鼎盛期。

第二大发展阶段上的西方社会学以帕森斯对先前各派社会学取向的尝试性综合为起点,然而最后却以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分化为终点。在先前的第一大发展阶段上,社会学家们的分歧还主要是围绕着主观与客观、维护与批判等方面展开的;而到了第二大发展阶段上,先前的分歧不仅没有被消除,而且还产生了许多新的分歧与对立,如抽象分析与经验研究、宏观与微观、冲突与均衡等等。社会学的更加分化,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学研究的繁荣,加深了人们对社会过程各个侧面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也将社会学带入了新的困境。社会学大大小小的各个流派各执一端,互不沟通,将社会图景分裂为互不联贯

的许多碎块,既阻碍了人们对社会世界的完整认识,也阻碍了社会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实现不同社会学流派之间的沟通和综合,似乎显得比以前更为紧迫。正是对这种新的综合的期盼,将我们带到了社会学发展的当前阶段。

3. 本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进一步发展阶段

西方社会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正是以新的综合为其特征的。其新的特点是:第一,与帕森斯的理论综合活动相比,新的理论综合活动所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但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也更加精致;第二,与帕森斯时代相比,当代的理论综合活动显得更为普遍,参与的人数也更加众多,不仅包括大量处于各理论流派之外的学者,也包括许多属于各理论流派之中的学者。他们或者是试图以一种不偏不倚的立场来对原有的各派理论进行综合,或者是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向或主题来沟通原来各派的合理内核,或者是试图在坚持原有某个理论传统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吸取其它一些理论传统的思想与观点,将自己的理论传统发展成为一个更具综合色彩的理论。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系列综合性的社会学理论,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集合”态势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

实际上,对帕森斯以来各派对立理论进行综合的尝试工作早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乃至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如前文已提到的科塞、伦斯基等人对功能论与冲突论所进行的综合,布劳以交换论为基础为宏观、微观社会学所作的综合等,都是颇有影响的一些例子。除此之外,巴克利、彼得·伯格和卢克曼、柯林斯等人曾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尝试消除社会学家们之间的各种分歧与对立,融会各家各派的合理成果。然而,总体上看,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学的主流趋势还仍然是“分”而不是“合”。“综合”立场得到较为广泛的接受,理论综合形成一个较明显的趋势,应该说是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

新功能主义是当前西方社会学界影响最广的综合性理论取向之一。它的提倡者包括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柯罗密,德国社会学家蒙奇、卢曼,英国社会学家阿切特等一批著名学者。其代表性作品有亚历山大的《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亚氏与柯罗密等人

合编的《新功能主义》、柯罗密编的《新功能主义社会学》、卢曼的《社会系统》、蒙奇的《行动理论》、阿切特的《文化与主体性》等等。新功能主义的基本思路是要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论、互动论、现象学、交换论、批判论等对立学派的研究主题及思想观点,将它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亚历山大认为,在众多的理论流派当中,只有帕森斯的分析模式为社会学理论的一种新综合提供了唯一可行的基础。因此,他努力于从事这种对功能主义传统进行重新解释的工作,并力图将其它各派的理论成果与这种重新解释过的功能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以期为新功能主义取向确立一个有效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蒙奇以新康德主义哲学为指导、卢曼以系统理论为形式来进行上述工作,柯罗密、阿切特、斯梅尔瑟等人则以各种局部性的研究领域(分化理论、社会与文化关系的理论等)为依托,来推进新功能主义取向的确立。但总的来讲,新功能主义目前还是一个尚待进一步发展的理论运动,它只是体现了一个新的理论方向。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新功能主义者们也还未获得一种共识或主导性认识。

英国社会学家A·吉登斯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则是从另一个方向上来进行理论综合的一种尝试。吉登斯将“结构”理解为不断地卷入到社会系统的再生产过程之中的规则和资源;结构对人的行动不仅具有制约性、中介性,而且还具有转换性和传递性。在《社会的建构:结构化理论大纲》一书中,吉登斯对其结构化理论作了最系统的论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虽然是想沟通社会学中的微观立场与宏观立场、主观立场与客观立场等等各种各样的对立面,但与新功能主义相比,它还是较多地倾向于微观与主观的一极。

如果说新功能主义是以功能主义传统为基地来综合各派之说,吉登斯是从现象学、本土方法论、符号互动论等主观社会学出发来融合各种对立的取向,那么,哈贝马斯则是试图站在批判理论的立场上来会通诸子百家。在其最具代表性的巨作《沟通行动理论》一书中,他试图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韦伯的诠释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阿多尔诺、霍克海默等人的思想溶合起来,提出了一种被乔·特纳认为是“富有创造性的

综合了各种思想的批判理论”,即沟通行动理论。他采用了沟通行动、生活世界和系统三个基本概念,利用上述各家已有的思想成果,对社会过程中这三者的性质、机制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从批判理论的角度来会通了社会学中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诸种不同的理论取向,又以其它各家各派的思想来改造批判理论,从而构造了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综合性社会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是以理论综合为自觉目标的另一种有影响的当代社会理论。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是其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则是科尔曼的代表作。在该书中,科尔曼明确地对美国社会学中理论研究经验研究之间、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之间的脱节表示不满,提出要探讨将它们联结起来的方式。与迪尔凯姆等人一样,科尔曼坚持认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解释社会现象,而不是解释个人行动,社会科学应当以解释社会系统行为为重点。但他又接受了韦伯等人的主张,指出社会系统行为归根结底是许多个体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必须以对个体行为的微观分析为基础来解释宏观的社会现象。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实践理论或生成性结构主义,也是一种在当代具有广泛影响的、既富有强烈的理论综合色彩又具有鲜明的个性风格的社会理论。在《实践理论概要》、《实践的逻辑》等著作中,布迪厄力图超越那些长期困扰社会科学的二元对立,如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宏观与微观的对立、结构与主体性的对立、符号性与物质性的对立等等,提出一套更为全面、更为合理的分析社会现实的研究模式。布迪厄理论的核心范畴是实践、结构、场域、资本与惯习等。他认为,实践是场域(及结构)与惯习之间辩证关系的产物,因此,实践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布迪厄确立了一套与此观点相对应的社会研究方法,并将其运用于经验研究,为人们提供了若干具体的研究范例。

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晚年得志,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界声誉鹊起,与其论著中所体现的理论综合色彩也不无关系。其初版于1939年的早期著作《论文明的历程》在当时影响不大,但到了六七十年代后却日益获得广泛的注意,盖与本书所包含的那种力图跨越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

二元对立的倾向,与当时欧洲的知识氛围不合而与现时西方知识界的努力方向甚为默契有相当关联。这种力图突破各种二元对立,从对立面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中来把握各种社会过程的研究取向,在埃利亚斯晚年的重要著作如《符号理论》等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除了以上列举的诸位学者及其理论活动之外,理论综合的趋势也出现在其它一些理论传统的发展过程中。柯林斯从80年代以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继续致力于把交换论、互动论、拟剧理论等微观社会学的思想结合到冲突理论模式中去,力图在冲突论范围内实现微观、宏观理论的结合。与新功能主义者企图“重建”帕森斯的理论一样,符号互动论者们也力图“重建”布鲁默的思想。他们日益寻求与包括结构功能主义在内的其它各种理论传统的结合,努力将符号互动论推进到后布鲁默主义时代。艾默生·库克等人则提出了网络交换理论,试图以此为基础来解决宏观—微观的联结问题,发展出一个更为综合的理论框架。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已出现的综合性理论如新功能主义、结构化理论等等进行更高层次的综合,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K·贝利和乔·特纳等。凡此种种,都推动了社会学各种取向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接近,在西方社会学界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态势,以致于有人欢呼西方社会学正在进入一个“特别吉祥的年代”。当然,确当地讲,西方社会学的新综合阶段还刚刚开始,成熟的综合性成果还不多见,现状与目标间还有相当的距离,学者们还在不懈努力。但令人鼓舞的是:新的起点毕竟已经出现。

二

以上我们对西方社会学的三大发展阶段、各阶段上社会学诸流派或取向间的传承流变以及各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了一个简要的描述。按照这个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学迄今为止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分化(分歧、分裂)与整合(统合、综合)两种态势交互更替的演变模式。具体地说:

1. 上述西方社会学的每一个大的发展阶段都是以某种或诸种理论整合取向的出现作为起点的

在第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上,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斯宾塞和迪尔凯姆的工作,可以视为社会学家们努力建构一个综合取向的社会学框架的最初尝试(尽管社会学后来的发展证明他们所建构起来的理论有着种种偏颇);他们力图把各种社会研究纳入到实证科学的轨道上来。第二个大的发展阶段则是以帕森斯明确的理论整合活动为起点的。而第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当前阶段,社会学们则更是以各种各样的新综合理论来作为进入表演舞台的入场券的。这表明,在西方社会学迄今为止的每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上,理论整合总是社会学家们的首选目标。

2 西方社会学家们每一次在理论整合方面的努力,似乎都是以引发了各种相反方向的努力而告终

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试图以实证科学精神来一统天下,结果却激发了诠释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导致了社会学领域中三足鼎立的局面。帕森斯通过对实证社会学和诠释社会学的综合,来为社会学提供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不期却引发了社会学内部范围更大、内容更为具体的分化与对立。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新综合活动则更是与各种不同的分歧与对立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各种综合理论之间既存在着合意又存在着歧见,是合中有分,分中有合。这又表明,虽然理论整合总是许多社会学家们的首选目标,然而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却是异常艰辛,充满了荆棘和陷阱的,以致人们常常对这个目标本身的合理性产生怀疑。

3 从西方社会学发展到今天为止的总过程上看,分化与整合似乎是对孪生兄弟,总是循环交替、形影相随的

由于理论整合方面的困难,理论整合的努力往往最终总是导致一种或一些貌视综合实则有着许多局限(如实证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的“伪综合理论”的形成,结果是促使了许多对立面的相继产生与发

展,导致了分化局面的出现。理论上的分歧与对立则提示了许多需要人们去进一步讨论,并通过这些进一步的讨论去贯通和整合的新问题。在分化阶段,各种对立取向的竞争与发展使社会学在许多互不连贯的主题或领域内达到了令人赞叹的“片面的深刻性”。这些虽然“深刻”但却残破不全、互不连贯的研究成果势必再一次激起社会学家们对它们进行整理、综合的巨大兴趣。但新的整合势必也会有新的局限,新的局限又导致新的分歧与对立……如此循环不已,造成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分交替的变动态势。然而这种循环并非是简单的重复。每一次新的分化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许多新的“片面”,而每一次新的整合则使我们对社会现实各种“片面”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由此可见,无论是分化还是整合,都是社会学发展的有效途径。正是通过分化与整合的不断交替,推动着社会学一步步地发展、成熟起来。以此观之,当前西方社会学中出现的新综合态势,实在是蕴含着社会学大发展的新契机。

毋庸置疑,以上模式描述的与其说是西方社会学发展的实际历史过程,不如说是它的内在逻辑过程。历史与其逻辑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一致。实际的历史过程,肯定是充满了种种偶然性,充斥着许多与上述发展模型不相协调的东西,不会像我们上面描述的那样清晰、阶段分明。然而,逻辑与历史也不是完全背离的。逻辑毕竟是来源于历史,毕竟是历史本身的逻辑。逻辑过程与历史过程,在总体趋势与内在精神上,应该说是完全一致的。以此来理解逻辑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恰当地把握我们前面描述的西方社会学发展模式的真正价值,而不至于将其意义任意地缩小或者夸大。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指出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

(责任编辑 王能昌)